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丛书

先 刚 著

永恒与时间

——谢林哲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丛书

永恒与时间

——谢林哲学研究

先 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先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5713-4

I. 永… II. 先… III. 谢林, F. W. J. (1775 ~ 1854)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丛书

永恒与时间

——谢林哲学研究

先 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5713-4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韩水法

编 委：赵敦华 靳希平 杜小真

尚新建 韩林合 张祥龙

总 序

北京大学的外国哲学研究素有渊源,自北大开校以来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名家辈出,成绩斐然,不仅有功于神州的外国哲学及其思想的研究,而且也有助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北大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学术视野日趋开阔,评价观点百家争鸣,研究领域自由拓展。巨大的转变,以及身处这个时代的学者的探索与努力带来了相应的成果。一大批学术论文、著作和译著陆续面世,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新趋势。

二十余年又过去了。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新作迭出,新人推浪,应当付梓以飨读者,扩大影响;一些著作或者出版既早,虽然广受欢迎,但坊间已难获一册,或者在海外付梓,此岸读者无缘识面,需修改而出新版;一些著作面世之后不久作者即在观点、材料方面新有所获而当再版;一些很有学术参考价值而颇堪一读的学术论文由于分散在不同的杂志、文集里面,查阅不便,而在现代学术领域,论文是学术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作品形式,需结集发行。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将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性文字汇编成丛书,以见系统,以便参考,实属必需。此套丛书于是因应而生。它的宗旨是有计划地陆续出版北大外国哲学研究领域有影响、有意义的著作,既展现学者辛勤劳作的成果,亦反映此间外国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

2 永恒与时间

不过,此套丛书只是展现了北大外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所收录的只是其中的部分著作,许多著作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未能收录其中。我们的计划是通过持续的努力,将更多的研究著作汇入丛书,以成大观。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学术界对此套丛书予以批评和指正。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6年8月10日

目 录

谢林文献缩写.....	1
第一章 谢林的哲学生涯.....	4
第二章 关于世界时代哲学	44
第三章 谢林对于永恒和时间的先行理解	85
第四章 作为世界时代哲学的本原的“绝对者”.....	104
第五章 流溢与时间的原则,永恒开端	138
第六章 自然与生命:永恒时间	160
第七章 分离:时间的实现	190
第八章 谢林的时间学说.....	241
附录一 谢林哲学之走向本原和从本原出发的道路.....	310
附录二 “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 ——论谢林的宗教哲学思想.....	348
主要参考文献.....	382
后记.....	390

谢林文献缩写

说明:本书征引谢林原文的时候,一律遵循国际学界的标准做法,即前面给出《全集》或单行著述的缩写,后面的阿拉伯数字给出该卷册或该书的页码,比如“VII, 336”、“WA I, 33”、“SWA, 150”等等。下面列出的几个文献缩写是本书引据谢林原文时最常用的文献来源。至于本书征引的其他文献则分别在相应的地方予以交代。

I – XIV = F. W. J. Schellings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Cotta, 1856 – 1861. (2. Abteilung I – IV = XI – XIV.)

《谢林全集》, 14 卷, 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 1856 – 1861。

WA = *Die Weltalter. Urfassungen*. Nachlaßband der Münchner Jubiläumsausgabe.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Piper, 1946.

谢林《世界时代·原初方案》, 曼弗雷德·施罗特编辑, 慕尼黑, 1946。其中“WA I”指 1811 年原稿, “WA II”指 1813 年二版, “WA III”指《世界时代》关于“过去”部分的手稿片断, “WA IV”

2 永恒与时间

指《世界时代》关于“现在”部分的手稿片断。另需指出的是,“WA I”和“WA II”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不是指《世界时代·原初方案》一书的页码,而是 1811 和 1813 这两个版本原初排印完毕时的页码。

Fragmente = *Weltalter-Fragmente*. Hrsg. von Klaus Grotzsch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Wilhelm Schmidt-Biggemann,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2002.

谢林《世界时代手稿片断》,克劳斯·格罗奇编辑,斯图加特-巴德坎斯塔特,2002。其中的“NL 81”指第 81 号手稿(1814)。

Initia = *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 Erlanger Vorlesungen 1820/21*.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Bouvier, 1969.

谢林《全部哲学的原则:埃尔兰根大学讲授录(1820/21)》,霍斯特·富尔曼斯编辑,波恩,1969。

SWA = *System der Weltalter. Münchner Vorlesungen 1827/28 in einer Nachschrift von Ernst von Lasaulx*. Hrsg. von Siegbert Peetz.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0.

谢林《世界时代体系:慕尼黑大学讲授录(1827/28)》,西贝特·皮茨编辑,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90。

UPhO = *Urfassung der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1831/32*. Hrsg.

von Walter E. Ehrhard. Hamburg: Meiner, 1992.

谢林《天启哲学原稿(1831/32)》，瓦尔特·埃尔哈特编辑，汉堡，1992。

第一章 谢林的哲学生涯

谢林(1775 - 1854): 昨日的巨星, 今天的经典, 明日的传奇。他的一生是奉献给哲学的一生。和大学同学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相比, 谢林少年得志, 作为一个大学生就参与到德国哲学当时最高层次的原创和讨论中。他二十三岁时即获得名牌大学的教授席位, 成为当时德国哲学界的头号人物, 并在三十岁之前就达到了哲学声望的顶峰: 他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天之骄子, 他的先验唯心主义、自然哲学、同一哲学、艺术哲学成为当时支配哲学界的主流思想。然而, 前半生的无比辉煌恰好映照出谢林此后年月巨大的失意和落魄, 1805 年放弃大学里的教职和从 1809 年起停止发表哲学著作更是造成其学术影响一落千丈, 虽其古稀之年时的短暂“复兴”——1841 年前往柏林大学接任黑格尔的教席——仍然无补于大势: 人们不知道谢林哲学的进展如何, 渐渐地也不再关心他在思考什么。关于谢林后半生的“沉沦”的原因, 人们有很多臆测,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时代表思想的环境(比如黑格尔和雅各比的批评), 从谢林自己的人生经历到所谓的“思想危机”, 等等。或许这些都算得上是原因,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果所谓的“失意”主要指的是在公众和出版界那里没能始终保持响亮的名声和人气, 那么这对于评价谢林的哲学来说, 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相对于永恒的思

想自身,名声和人气(无论它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方是多么的红极一时)终究是浮云一般的,思想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包括谢林自己年少时的无限风光又何尝不是如此。衡量思想的尺度始终是思想自身。只有具备这个基本意识,我们才不至于从一开始就轻视甚至忽略谢林后期的哲学思想。诚然,这些思想至今还笼罩在晦涩的云雾之中,不为人们所了解,正如他的早期思想也并不是总是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评价。

弗利德里希·威尔海姆·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于1775年1月27日出生于符腾堡公国的勒昂贝格小城,这里也是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的故乡。谢林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同时也是图宾根大学的一名颇有名气的东方学者。谢林是在浓厚的施瓦本文化传统气息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传统里,“施瓦本教父”——尤其是哲学家-神学家瓦伦丁·安德雷亚(1586-1654)、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和克里斯托弗·厄丁格尔(1702-1802)——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安德雷亚和本格尔是新教虔敬派的创建者和主要代表,厄丁格尔则将虔敬派极度关注内在心灵的特点和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雅各布·波墨)统一起来。厄丁格尔在图宾根大学上学期间读到了波墨的著作,把这称作“上帝的馈赠”,^①此后他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来宣传波墨的学说,在施瓦本地区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谢林的父亲曾经自称是“本格尔广义上的学生”,他的姨父也是一个“狂热的厄丁格尔

^① *Friedrich Christoph Oettingers Leben und Briefe*. Herausgegeben von K. C. E. Ehmman, Stuttgart, 1859. S. 36.

崇拜者”，这些都表明了幼年谢林成长起来的精神环境。现在我们也知道，谢林和黑格尔都是通过厄丁格尔的著作才接触到波墨的思想的，而且在这过程中很自然地也接受了厄丁格尔自己的诠释发挥，^①另外也可以看出，后来谢林和黑格尔不约而同地一致高度推崇波墨绝非偶然的巧合。一般学者认为，谢林是从1809年写作《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以下简称《自由论文》)前后才受到波墨影响，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波墨-厄丁格尔的影响痕迹在谢林的早期哲学就清晰可见，比如对于“自然”的独特理解和强调，神秘主义思辨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等等，都是施瓦本精神传统不容混淆的金字招牌(我们在黑格尔那里也能够找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这里不是要片面地强调波墨等人的神秘主义传统的影响，而只是指出谢林某些思想的发生源头。再者即便是波墨他们的思想也不是绝对原创的，而是起源于更早的哲学传统(古希腊的神秘主义、柏拉图的口传本原学说、新柏拉图主义等)，一旦细细追溯将会突破本书既定的阐述范围。事实上，对于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海纳百川的伟大哲学体系而言，各种思想传统都能够在里面扎根立足(尽管重要性各有不同)，在研究中片面地强调或者夸大某些人头或线索的支配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他们并没有多大的益处。

谢林在贝本豪森(Bebenhausen)接受了最初的教育。贝本豪森是图宾根城北两公里处的一个群山环抱的，四周围绕着扇面般的巨大斜坡的袖珍小镇，其美丽幽静的风景和独特的姿态总让人联

^① Gerhard Wehr, *Aspekte der Wirkungsgeschichte Jakob Böhm's*, in *Gott, Natur und Mensch in der Sicht Jakob Böhm's und seiner Rezeption*. Hrsg. von Jan Garewicz und Alois Maria Haa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4. S. 175 - 197.

想起大自然里的一颗明珠。这里有一座建立于十二世纪的修道院,同时担任教会学校的角色。谢林从一开始就展露出惊人的才华,他在八岁时就熟练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十岁时他转到纽尔廷根(荷尔德林成长的地方)学习,十二岁时就完成了中学学业。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能进入大学,所以谢林的父亲又把他接回贝本豪森,自己给他上课,而且请来著名学者(比如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罗伊希林)为他进行专门辅导。确实,尽管施瓦本地区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一向盛产诗人和哲学家,但像谢林这般程度的“天才神童”仍然是罕见的。就以语言为例,除了前面说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谢林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些基本功为谢林后来的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助益,正如晚年的谢林在回忆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时所说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精神的那种形式训练比任何抽象的逻辑学和修辞学都更能让我注意到各种思想的最精微的层次和差别,并且将其表述出来。学习古典语言给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好处,即从古代的伟大著作中直接汲取营养,在贯穿这些著作的精神身上不断地提高我自己,给我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XIII, 4)

谢林在十五岁(1790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这已经是特获批准的结果,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年满十八岁才能上大学。图宾根大学建立于1477年,是符腾堡公国的“国立大学”。这所大学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异类。因为当各个诸侯都陆续地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国立大学的时候,他们的选址要么在自己的首府(比如海德堡),要么在经济枢纽(比如科隆)或者主教

驻地(比如巴塞尔),总之是一些“发达的”城市。按照这个惯例的话,符腾堡应该在首府斯图加特建立自己的大学,但是大胡子埃伯哈特伯爵却突发奇想,偏偏看中了斯图加特以南三十公里处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图宾根。从这一刻起,图宾根成为了符腾堡—施瓦本精神的风水宝地,这个内卡河畔的美丽小城,这所地位显赫的古典大学至今一直都是德国最典型意义上的“大学城”。在谢林他们之前,尽管图宾根大学三百多年来已经孕育出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thon)、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植物学家富克斯(Erich Fuchs)、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等响当当的人物,但她就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德国文化界还谈不上有什么重要影响,这是由当时符腾堡落后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专制闭塞的精神环境造成的。只有从“图宾根三星”(人们这样称呼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开始,图宾根大学才真正踏上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精神大道,以其坚守古典人文传统的风格在德国众多的名牌大学里独树一帜,享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故乡”、“学者共和国”等美誉。

但是,当我们透过精神后来的辉煌成就来审视谢林那个年代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图宾根大学——尤其是她的神学院——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和教会培养必要的人才。神学院的日常管理是一种极为严格死板的形式,这里的生活甚至与修道院相差无几:恭顺、服从、秩序是最高的法则,学生们必须住在集体宿舍里,起居、学习和外出活动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必须穿统一的制服(修士服装),必须参加所有繁琐的礼拜活

动,严禁逃课(不管那些课程是多么的无聊乏味),不允许进酒馆、跳舞、抽烟——所有这一切都有人专门监视,并随时记录在案,定期向斯图加特那边汇报,然后由大公决定各种奖惩措施。这种教育方法对于年轻学生的精神和人性的摧残折磨是难以估计的,至少我们知道荷尔德林在这个时候就埋下了精神失常的萌芽,他在发疯多年之后都还保持着对于神学院的深重敌意,而且清楚地告诉别人他当年是被强迫“献身”给了基督教神学。^①当然,野蛮的奴化教育也必然带来激烈的叛逆和反抗。当时的图宾根大学生为法国大革命欢呼雀跃,有的人甚至逃学去法国参加革命队伍。在私底下,他们热烈地讨论康德、卢梭、古希腊罗马的诗歌文学、还有席勒最新创作的《强盗》,他们嘲笑甚至谩骂自己的老师,而且发展到与校方和当局冲突的地步。

谢林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按照教学计划,首先要在哲学系学习两年。但哲学系本身从属于神学院,哲学系的教授都是由神学系教授兼任,这些教授讲授的东西大半仍是神学的内容,他们本身对哲学没有多少兴趣,对于当时已经兴起的康德哲学要么不理不问,要么就是把康德哲学歪曲成一种不痛不痒,甚至为神学服务的东西(比如康德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批判被解释为应该放弃理性研究而回归圣经信仰)。不管怎样,谢林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莱布尼茨的哲学。两年哲学学业期满的时候,谢林用拉丁文撰写了硕士论文《根据创世记第三章对有关人类罪恶起源的远古箴言进行批判阐释和哲学阐释的尝试》。这篇论

① 荷尔德林《塔楼之诗》,先刚译,第79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文谈不上有什么原创思想,但它表明谢林已经阅读了康德^①、赫尔德、莱辛的著作。与硕士论文同时写成的还有两篇“专题论文”,分别是《论一种没有专门名称的哲学的可能性,兼评莱因霍尔德的基础哲学》和《理论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一致,尤其是关于范畴的使用,以及这个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实现》。这两篇论文已经遗失,但是它们的标题告诉我们,17岁的谢林对于当时最新的哲学(康德和莱因霍尔德)已经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谢林入学三年之后即1793年,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他们是1788年入学的)毕业离开了图宾根。在神学院的时候,谢林、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曾经居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是事实。因为这三人的后来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所以后人对于他们在图宾根上学期间的交往也充满了许多美好的设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他们曾经为庆祝法国大革命而到东山上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不过还找不到任何一手材料来证明有这件事。实际上,能够证明他们三人的友谊和思想交流的文献都是在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毕业离校之后产生的,所以对于他们在上学期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有一个大致的推测。从现在保留下的文献看,谢林和黑格尔,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之间书信较多,谢林和荷尔德林的通信则要稍少一点。黑格尔在毕业离校后对朋友长期保持沉默,直到一年多以后,即1794年

① 康德于1786年发表了《人类历史的毅然果断的开端》,这篇论文把旧约的《创世记》第三章中关于堕落和原罪的说法理解为这样一种传说,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表述出故事后面的理性真理。这种理性的、历史的解释《圣经》的方法是由斯宾诺莎在其《神学政治论》(1670)里首先开创的,他与神学家针锋相对,认为基督教中的历史因素只不过是表述理性理念的工具。启蒙运动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继承了这些基本思想,后来的费尔巴哈和大卫·斯特劳斯也是走的这条路线。